

负笈北京大学

白化文 著

周燕孙先生穿西服，有时配皮鞋，有时却穿便鞋（包括脚垫处很爱顶破的胶儿鞋）。我想周先生不是没有皮鞋，也不是不懂搭配方式，可为什么还这样穿？吴小如先生说：“那是‘派’！北大就兴这个派！”

季羡林先生当时不过30多岁，腰板挺直，从容出入，望若神仙。听说是胡校长特聘来的，会好几种失传许久谁也不懂的外文呐。就冲他敢单身住在凶宅深院，就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啦。我惹，他一定是一位勘透了天人三界无所畏惧的大丈夫。

杨慧修先生是老北大哲学系毕业生。五四运动中“火烧赵家楼”一役，他是第三个爬墙进去的。他和我闲谈，说：“我念北大，采取‘三yang政策’：看洋书，吃羊肉，听杨小楼！”

自建北京大学

——从“京师大学堂”到“北京大学”——

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朱清江 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花生万象

负笈北京大学

白化文◎著

江西出版集团 · 江西教育出版社
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负笈北京大学/白化文著. —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07. 12

ISBN 978 -7 -5392 -4840 -0

I. 负... II. 白... III. 白化文—回忆录 IV. K825 -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8854 号

书 名: 负笈北京大学

著 者: 白化文

出 品 人: 傅伟中

责任编辑: 冷新吾

特约编辑: 程忆南

装帧设计: 翁 涌

出 版: 江西教育出版社

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

邮政编码 330008

发 行: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32 开 (880mm × 1230mm)

8.75 印张 170 千字

定 价: 25.00 元

目 录

- 1 就读育英中学（1943～1949）
- 33 记 1947 年北平秋季运动会
- 53 负笈北京大学（1950～1955）
- 86 熏陶
——从沙滩到未名湖
- 92 定位·从师·交流·考察
- 101 我所知的老北大出版组（部）
- 110 抗战时北大学生存在图书馆的书
- 114 我的笔名与姓名
- 117 我所了解的白宝山和陈调元
- 181 京剧富连成科班的东家
——外馆沈家

- 198 普及佛法的大名家周叔迦先生
- 202 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两位先驱者
——周绍良先生和关德栋先生
- 218 纪念周太初（一良）先生
- 225 师门仰望三题
- 237 想念阴少曾（法鲁）先生
- 243 王有三（重民）先生百年祭
- 247 王了一（力）先生与《文史知识》
- 254 朱季黄（家湣）先生与《文史知识》
- 259 启先生是圣人
- 261 追忆褚斌杰学长二三事
- 266 恭祝秋浦周先生并沈夫人米寿暨结缡七十载寿序
- 267 秋浦周先生八十寿序
- 269 《周绍良先生欣开九帙庆寿文集》征稿小启
- 270 周绍良夫妇墓碑
- 271 临清季希逋先生九十寿序
- 273 临清季先生九十整寿征文小启
- 274 选堂先生米寿献辞
- 275 后记

就读育英中学（1943～1949）

概述育英当时情况

北京市原私立育英中学是一所老学校，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并直接管辖，直到解放后为止。2004 年是建校 140 周年，10 月份曾大事庆祝。可是，笔者所见，回忆录较少，写来也都规规矩矩，从侧面反映者不多。我就凑凑热闹，写点个人直接见闻、亲身感受。偏颇之处一定很多，说的倒都是实情。惟在抛砖引玉而已。

育英中学分五个院落。一院为初中部居西，四院为高中部居东，均坐落在灯市口大街上，中间隔一个通车的南北向小胡同，叫做“油房（油坊）胡同”。油房胡同应该是往北通东西向的大胡同报房胡同的，可是中间被许多宅院堵死，成为死胡同。它的北半截即通报房胡同的那一段，也叫油房胡同。且说，南边的报房胡同往北成为死胡同的底部，有个东西横向之处，学生称之为“盲肠”的，胡同里遮拦起帐篷，卖起馄饨、烧饼夹猪头肉等饭食，馄饨盛在碗里晾着，下课十分钟特别是第二至

三节课休息 20 分钟时（高中为上理化生物等课借此换教室）偷偷来此，拿起碗来一喝就完；还有个卖花生仁儿的，用报纸包成尖顶小包，分揉去皮儿（上课时偷吃地上不留皮儿）和不揉皮儿两种，前者略贵。这都是专门供应育英学生的。

一院后门正对二院小学部大门。绕羊肠小道，西折，经大小鹁鸪市两个接连的胡同，入王府大街。这条路线是育英的行车路线。当时骑车上学者约占半数，高中部唯一出入自行车的后门开在油房胡同东侧，初中部从灯市口正门和油房胡同南侧拐角处的后门均可出车，小学部则由油房胡同北侧拐角处出车。每至上下学，车如流水，起码 20 分钟才能走完，中间夹杂步行的如笔者之类。胡同颇窄，两辆大汽车无法对开，小汽车也得紧靠墙对蹭。杜聿明时任东北蒋军司令，他的家眷住北平，占据弓弦胡同一片大宅邸，可能是清初由李渔造园的半亩园，民国初年由名士郭啸麓（则沅）先生整修过的（郭老是俞平伯先生的姐夫）。杜氏的女儿杜致礼在贝满，约比我们低两个年级，自己骑车上学。贝满的学生都走灯市口大街。杜致礼的弟弟在灯市口小学读书，由副官、司机等几人护送，坐军用吉普车上学，走大小鹁鸪市路线。司机经常放任，让小孩驾车。小孩的腿够不着刹车闸呢！一路横冲直撞，我们每日“不见不散”（这是当时说评书的常用的词语），提心吊胆。

“育英学校”是中小学部全称，匾额悬挂在一院大门前。三院在骑河楼，南部是学生宿舍。个别家在外地的单身老师，如仓孝和先生也住在那里。北部是体育场，有 300 米的不规范椭圆形跑道：东西两侧贯通南北的跑道是规范的，东侧的南北跑道延伸可供跑 110 米高栏使用；南北两侧贯通东西的跑道各只

有 50 米左右，一圈儿加起来也就 300 米上下，与 400 米正规跑道没法比，但在当时的中等学校里就算上等的了。当时北京的中等学校的跑道，没几个正规的，例如，唯一的师范学校（当时在西城端王府夹道）跑道 360 米，就算好的了。

育英还有个少为人知的五院，在东单北大街路东一个小死胡同里，与基督教青年会隔街相望。里面是个黄土地大空场，只在东北角有两间平房，看房子的人常年居住。这院子平时不用，冬季租给开滑冰场的人，搭席棚，泼水成冰，卖票供少爷小姐玩乐。育英、贝满的学生受优惠待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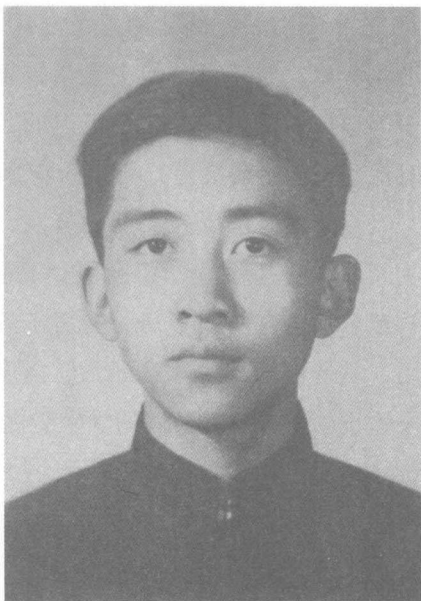
育英与毗邻的贝满女中是同一教会所办的兄妹学校，关系密切。

我的初中时期

我在 1943 年暑期报考育英和辅仁大学附中两所中学，均取中。辅仁大学与附中是私立学校，由梵蒂冈天主教（自称“公教”）圣言会创立并直接管辖，收学费较多，听说校规也很严。育英呢，自 1941 年 12 月 8 日（日本人的算法，见于汪伪 1943 年才公布的对英美荷宣战书，自 1943 年起每个月 8 号必集中全校师生宣读一遍，这个倒霉差使在“八中”由训育主任年景丰先生承担；美国人则记录为 12 月 7 日）日本“皇军”向英美荷等国开战后，美国教会学校全部被封。当时，敌伪教育局所属市立中学沿袭抗战前国民党的建制，共有男中第一至第五中学五所，女一中女二中两所。这次接收美国的教会中学，编入市立中学建制。育英称为第八中学，贝满称为第四女中。育英小

学部改称市立灯市口小学。

按，改变建制以前，北京市内有同名的两个“私立育英小学校”，一所的校址在鼓楼内西碧峰寺胡同，原系女子小学，1925年起男女兼收。而我们的育英小学部却是只招收男生的。贝满女中的“小学部”是“培元小学”，校址在王府大街，只招收女生。灯市口小学的毕业生，一般升入育英中学。临文不忘，说个典故：



作者初中毕业留影（1946年）

老北京的老太太们，把还不够上小学年龄的小男孩儿的生殖器称为“小鸡子”，口头语是：“再闹，把你的小鸡子剪（读做“绞”，jiǎo）下来！”男孩儿上了小学，同学间通称男性生殖器为“der”（轻声）。简称灯市口小学为“der小”。到了中学，人大了，对自己的就不称“der”了。但是，中学部的十二年一贯制“der小同学”，彼此间总有一种亲切感。我不是此种出身，生往里挤也挤不进去。当然，此种界限很不明显，倒是提倡“育英精神”。

育英虽然改为八中（注意：不是解放后新设立的八中），内里一切照旧，人事并无大的变动。听说校长李如松曾被捕受刑，不久放出。又听说校长有手段有办法，请来一位日本顾问。这位顾问是个老病号（肺病？），长期休养，我入校后就见他来过

一次。校内除添设日文课程外，一切如故。日文课从初一上到初二，初三赶上抗战胜利，此课取消。初一时教课的老师姓名忘掉了，大约是一位落魄的留日学生，非常低调。初二时又来了一位兼职的日本皇军的中国翻译官。当时正值美国空军轰炸西郊机场，鬼子下旨，全市学生要学习皇军，打裹腿。这是“战时体制”！翻译官的制服是浅灰粉色小洋服，打领带（沙家浜中的翻译官打扮依稀似之）。他就这样在西服裤子上打裹腿，实属奇装异服。他还检查我们打了没有呢！还有一种日文口语选课，我选了。是一位日本侨民老太太教。她会中国话，很和善，从不涉政治。

我入校后，初中三年都在乙班。初中分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个班。据我体会，都是混编，并不按成绩编班。敌伪时期，北京的中小学生都穿灰色学生服，小学生戴一种圆形蛋壳帽，解放后到现在的考古队队员都戴此种帽子，但质料较好。中学生则戴软体带帽檐的学生帽。“八中”则独出心裁：穿蓝色学生服（灰色的也凑合，但认为非本校制服），戴硬壳帽，帽子上要嵌一颗八角形（如某些日本和中国的北洋政府颁发的勋章的形式）帽章。上衣的扣子为铜钮扣，帽章与钮扣均轧出“八中”两个篆字，这也是当时的校徽，有点效仿鲁迅先生为老北大设计的校徽的样子。据说乃美术杨老师设计。这些都在高中部事务处售卖。我入校前不明就里，新做的是灰色制服，赶紧去染了。其实，学校对制服穿着与否并不认真考查。只是敌伪规定，中小学男生一律推平头。抗战胜利后，规定无形中取消。我从初三起就留分头、穿大褂了。

当时的学生时兴给老师起外号，并无恶意，因为称老师的

名讳，连“老师”二字，总得念出四五个音节，还显得太正式，不如用代号方便亲切。我们年级同学口头说的代号，绝大部分是老学长传下来，沿袭使用的，有的已是老太太的被——盖有年矣。我忠实记录野史，并无对老师们不敬之意也。

初中一年级，我们遇到了几位好老师。教国文的是朱一麟先生。他那时二十多岁，穿长袍，戴金丝眼镜。他讲古文与现代文章都很拿手。记得一次讲课时遇到“浪漫”“浪漫派”两词，促狭的学生故意举手，请求解释。朱先生不慌不忙，举例说：自己有个朋友，学艺术的，满身油画颜色，新买的白皮鞋故意涂成五颜六色，养女人一样的披肩长头发，一边走路一边唱外国歌，这就是浪漫，这就是浪漫派！我想，老师真是善于解围呀！至今记忆犹新。朱老师眼睛大，外号“朱大眼儿”。他教完我们这一年级就走了，传言他去后方了。当时称非沦陷区为“大后方”。

教“小代数”的是阮建中先生。讲解通俗易懂。我认为，在我从学过的数学老师中，阮老师讲课是最好的了，起码是最容易听懂。他教完我们年级也走了。有的同学说，他在后门大街上开了个小杂货店。我去找过，没有找到。大家揣测，阮老师可能是以经商打掩护，干抗日“地下工作”呢。阮先生外号“软中硬”。

教英文的是龚明善先生。他的堂弟龚明信教体育。龚明善先生个子颇高，腰板挺直，身穿西服，内衬翻领衬衫，这是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休闲打扮，有的美国和中国电影明星也跟着学。我觉得这样做可以避免打领带的麻烦，又省得勒脖子出不来气，因而在自己中年后也常常这样装束。龚先生教英文极

有耐心，对学生和气，是一位好老师。听说他的网球技术很好，在北京上名次。

全校唯一的教美术的老师是杨士林先生，他又矮又有点瘦，老绰号“杨部长（谐音‘不长’）”。当时北京中小学生普遍轻视“小三门”即体、音、美，不过育英重视体育，许多学生受同学与洋派家庭等影响，也重视音乐，课外组织育英、贝满歌咏队等活动。只可说轻视美术、书法罢了。杨先生多年一贯的做法是，只要学生提出不画画儿了，讲点什么，他就立即答应，开讲时事。敌伪时期，他用委婉的口气，讲点从重庆广播中听来的日军“转进”新闻。附带说一下：日寇垄断广播，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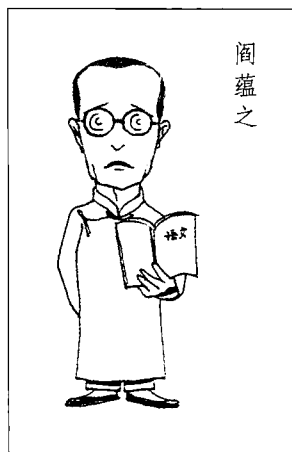


令北京市民各户必须购买（太穷的人可以不买）统一制造的一种两个电子管的收音机，只能听北京本地的节目。能听远方短波的收音机一律拆除上缴。实际上隐匿偷听者极多。我们的美术学习只学一年。抗战胜利后，杨先生因讲新闻受欢迎，有时就应邀到高中，借用“公民”和下雨时上不了体育等课堂，接着开讲。这时他委婉讲的可是“国军”某某将领在何处“成仁”（解放后听说，大部分“成仁”者是被俘或投降）的消息了。多年来，学生心照不宣，无人向敌伪和国民党打小报告，相安无事。就是敌伪大官的子弟，如“教育总署督办”王谟的儿子王彻，初一与我同班（抗战胜利后不知何往），也爱听杨先生这一套，他一定是暗保杨先生的，不然，早出事了。

书法教师是吴兰第先生。他常为东城一带的店铺写匾，有的一条商业街上，小一半的匾都是他写的。他是基督徒，但不传教。学生不爱临池，也总愿他在课堂上讲点什么。他就讲他会画国画“芦雁”，并在黑板上勾画解释。他还讲到自己如何去野外观察芦花与大雁。育英一院的几块大匾，如“育英学校”“二元”和刻在大门额柱上的校训“致知力行”，都是他写的。“二元”是指1934年“北平市中学生毕业会考”时，育英高中梁炳文、初中唐统一双登榜首，故悬挂匾额，以为纪念。



中国史和中国地理的教师都是一位崔先生。他的讲授法很特别。一上课，就叫学生把课本取出，放在课桌上，不许看书。大家静听他慢慢地讲。他其实是在背诵课文，背一句，喉咙里自然地轻轻地“嗯”一声。他把时间扣得极准，下课时，一节课文一定恰恰背完。我真佩服他能把两本教科书全给背下来，心想：哪天一换教材，你可怎么办！又想：如此教法，学生可说没什么收获。我本来对这两门课极有兴趣，经他一教，兴致索然。期末考试，及格而已。



初中二年级，教国文的是阎蕴之先生。阎先生人很和善，

教法平平。三年级时，就归张子成（名有为）先生教了。我与张先生的长子张殿京从初一起就是同班密友，常去他家串门，早就和张先生熟悉起来了。张先生口才极好，特点是：一不卡壳，二不重复，三没有口头语和“嗯”“哼”之类的毛病，四是以“神聊”擅长。我觉得他有说评书的天才。他每每先聊半堂课，然后再讲正课。他说，抗战前，监狱曾请他去给犯人讲大课，讲的都是古代修身故事。我益发认为他是说评书的能手了。他讲“作者生平”，旁征博引，如说刘半农之死，引用挽联：“活昆虫竟敢咬死教授，死文字哪能哭活先生。”此联抓住刘氏死因及对五四运动之贡献等要点，又便于青年学生理解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当时正值抗战胜利，国民党政府扬言要“甄别”沦陷区教职员，“甄审”大学生。张先生就在课堂上大骂，讲点“歪理”，说：“我们在沦陷区消耗敌人物资呢！”“你能跑，我们跑得了么！”我就给他起外号“张半堂”。自然经由张殿京传入张先生耳中。下一节课他就讲：“有人说我张半堂，我还要骂一堂呢！”下课后，我就对老师说：“学生是为您好。您这样骂来骂去，吃亏的是您！”他以后不再骂了。可是，他的业务结构过于陈旧，新文学通晓甚少。解放后就无法教书，只可在教务处呆着，尔后提前退休了。张先生是育英头一位对我有巨大影响的老师。我暗中向他学习“讲演术”，自己规定：警惕产生自己的口头语，不要“嗯”“哼”，要多举引人入胜的例证，不重复，逐渐练成口若悬河。后来，我毕生在努力这样做，很得益处。在张先生可能是自发的，我却是有意识地学习，变成自觉的了。可惜，现在我得了脑微血管多发性腔隙性梗塞，语言蹇涩，退步多矣！

初三上学期，教“外国史”的是关肇湘先生，外号“关大眼儿”，也因眼睛大并戴金丝眼镜之故。他是北京老名士关颖人（赓麟）老先生（1880~1962，解放后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）的公子。他的弟弟关肇邨约高我们两三班，毕业后先入燕大，后转清华建筑系，是梁思成先生高足，现为院士。关肇湘先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，英文极佳，在育英初二教一两个班英文，是因人手不够。主要教初三外国史。当时他似乎在辅仁大学读研究生。关赓麟老先生与育英有点关系（校董？），关肇湘先生来教课，有点“客卿”“玩儿票”性质，他那时可是一位大少爷，不指着薪水养家的呀！

关先生不知道，他可是第二位影响我一生的育英教师。先说他的教学内容与方法：他只是利用了课本的章节标题，完全不按课本内容讲。一上来，先教 B. C.（公元前）与 A. D.（公元后）两组符号。下面教课，就不断地出现历史年代，如：476 A. D. 西罗马帝国灭亡，中世纪史时期开始；1453 A. D. 拜占庭帝国灭亡，近代史时期开始，等等。因为上年级老学长说过，年代必考，差一个，错一个，都要扣分数，不及格者甚多，所以，大家死命记笔记。一堂课下来，必有数十个年代。同学们叫苦不迭。我从小有短期间内记数字的天赋（如记忆电话号码即是，但是，时间长了不复习就忘），特别适应，以之为乐。和挚友张仁佑比赛着记笔记，背笔记。大小考试（关先生经常在课堂上小考），两人并列前茅。关先生对我有点赏识了。我还和同班同学顾承志到关先生家中谒见一次。记得当时关府在东华门外一过护城河的路北一座院落中，此地大约不是那有名的南池子大街南弯子胡同内的“裨园”。关先生对我颇多鼓励。我说

自己外文不行，关先生说，将来可以主攻中国史。我告辞后，就单独一人到天安门前千步廊书摊上，买了一部三大册顾颉刚、徐文珊两位先生点校的《史记》白文本，回家自学去了。这部书的点校水平极高，特别是分段，很有独到之处。例如，最后一篇《自序》：“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治民。有子曰迁。”这两句自成一段。以下一顿，提行再起：“迁生于龙门……”就显得极有气势了。我在中学后几年，囫圇吞枣，翻来覆去，把此书的本纪、世家、列传大体上读了几遍。我深感不夹注而有标点、分段的白文本读起来文势通畅，便于浏览。



张仁佑（右）、黄传鼎（中）与作者在张宅合影（1987年冬）

这时，先母和先外祖母因种种打算，从南锣鼓巷的板厂胡同16号移居王府大街翠花胡同8号，其中就有让我受北大熏陶的想法，具见《熏陶》一文，不赘述。先母多次指出，我应习文。由是，在我下定应入中文或历史系的决心这一点上，关先生的潜移默化，功不可没。

可惜，关先生在初三下学期突然不来了。同学间猜测颇多，